

励耘文库

黄药眠

Huang Yaomian Juan

黄大地/编选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ZHONGGUO XIANDAI XUESHU JINGDIAN

总主编◎张 健

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励耘文库

黄药眠

Huang Yaomian Juan

黄大地/编选

眠

卷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ZHONGGUO XIANDAI XUESHU JINGDIAN

总主编◎张 健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药眠卷/黄大地编选.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0
(励耘文库)
ISBN 978-7-303-15044-1

I. ①中… II. ①黄…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文艺学—文集 IV. ①C53 ②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9494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40 mm
印张: 31
字数: 536千字
版次: 2012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9.00元

策划编辑: 赵月华 责任编辑: 王一涵
美术编辑: 毛佳 装帧设计: 张同龙
责任校对: 李茵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编委会名单

主 编：张 健

副主编：李国英 李春青 李怡(常务)

编委会成员(姓氏笔画为序)

刁宴斌 于天池 王 宁 王富仁 朱金顺

刘 勇 李国英 李 怡 李春青 赵仁珪

赵月华 张 健 陈 惇 聂石樵 郭预衡

童庆炳 谢纪锋 董晓萍 谭得伶

总序

“百年师大，中文当先”。描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学科的发展历史，这是一句经常被征引的判断。在一个较为抽象的意义上，它的确昭示了某种令人鼓舞的气象。不过，“百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实在曲折多变，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也可谓是源流繁复，“当先”的真实意义常常被淹没于时代洪流的连天浪淘之中，作为“思想模式”与“学术典范”的师大中文传统期待着我们更多地保存、珍惜、承接与发扬。

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肇始于京师大学堂，由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而有1908年5月的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月，从京师大学堂母体诞生了作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翘楚的北京大学。“办理学堂，首重师范”，作为与北京大学“一奶同胞”的北京师范大学，正是秉承这样的理念引领了现代教育与文化的发展，其首功勋绩由此铭篆于史。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里走出了符定一，我们优质的中国语言文学教育让这位著名的教育家与语言文字学家在后来创办湖南省立一中、执掌岳麓书院之时胸怀天下、垂范后学，培养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代优秀青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中文学科更是云集了当时中国的学术精英，如鲁迅、黎锦熙、高步瀛、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不时应邀前来讲学的还有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思想名流，可谓盛极一时。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辅仁大学，京师中文学科的漫漫历史清晰地记录着中国现代语言文学的学术历程与教育历程，这里，活跃着众多享誉中外的学术巨匠，书写了现代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华章：从九十多年前推行白话文、改革汉字，奠定现代汉语的基石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开创现代中国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卓越贡献，诸多学科先贤都将自己坚实的足迹留在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旅程中。

伴随着北京师范大学参与和引领现代中国学术坚实旅程的，则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风波与激浪。这里交织着进步对落后的挑战、正义对邪恶的战斗、真理与谬误的较量。作为民众教育基本品质的彰显，我们的学术精

英从来没有将自己的生命超脱于现实，从来没有放弃自己关注社会、“为人生”的责任和理想。中国第一流的语言文学学术哺育了中国优秀的校园作家，从黄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到苏童、毕淑敏、莫言，他们以自己的热情与智慧描绘了“老中国儿女”的受难与奋斗，为现代语言文学的学术思考注入了新鲜的内容；同样，在五四运动、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和抗日的烽火里，北京师范大学的莘莘学子与皓首穷经的教授们一起选择了正义的第一线，在这个时候，他们不仅以自己的思想和智慧，更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实践着中国士人威武不屈、身任天下的人格理想，他们的选择铸造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另一重令人肃然起敬的现实品格。

质朴坚韧的学科探求与身任天下的忧患意识，这不就是值得我们保存、珍惜、承接与发扬的学术传统么？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励耘文库》中增选一套能够记录、保存、彰显师大中文传统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系列，系统地总结我们曾经有过的学术业绩和文化贡献，希望今人能够借此缅怀我们的历史，又不断从中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

新世纪的中国，经济的繁荣与精神的隐忧并存、文化的多元与选择的歧路同在。作为新时代的教育家、新的学术事业的继承人，如何回首我们的历史、领悟我们的使命，如何理解我们的传统，这些话题本身的复杂与沉重远远超过了词语表述的轻松。在这个时候，重温先贤的智慧或许大有裨益，但愿这些温润的文字能够引领我们重返深厚的过去，走向更为辽阔的未来。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励耘文库·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编辑委员会
2010年3月10日

目 录

导 语/1

抗日战争时期/27

关于诗歌的朗诵/27

论敌人的文化进攻与我们的对策/27

目前文艺运动的主流(又名《抗战文艺的任务及其方向》)/30

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之我见/34

文艺上的中国化和大众化的问题(又名《中国化和大众化》)/37

论通讯的写作/42

艺术家的团结/47

文艺与政治/48

青年与文艺/49

听歌/52

论战地文化工作/54

希望两民族文学的交流/56

戏剧的民族形势座谈会(桂林诸家)黄药眠的发言/57

看了《心防》之后/58

一年之计在于春/59

怎样学习文艺/60

谈苦闷的象征/64

诗人节谈屈原/66

一个诗人的诞生——为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作/67

论屈原的诗/69

略论中国的诗史/77

诗，诗人的锻炼/86

解放战争时期/88

文艺工作者当前的几个课题/88

乡下人，你是从哪里来的？/92

“死去了的逻辑”与“可爱的错误”/96

论诗歌工作上的几个问题/102

从五四到今天——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112

香港文坛的现状/114

论创作的群众观点/116

新中国成立初期/118

中国知识分子与十月革命/118

思想的散步(哲学)/120

思想的散步(文艺学)/122

评《时间开始了!》/125

谈谈文艺上的几个问题/138

蒋光慈小传/144

郭沫若的诗——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做的专题报告/145

几点意见——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55

我在这次“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中所联想到的和体会到的/158

伊萨柯夫斯基的诗——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做的专题报告/162

黄药眠、贺敬之访问东德参加席勒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会的讲话稿/176

黄药眠、贺敬之关于访问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报告/178

对典型问题的一些感想/183

关于抒情诗的形象问题/185

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86

作家协会党组听取非党作家的批评——批评作协领导没有抓住文学的特点/192

- 看佛篇/193
塑佛篇/197
- “文化大革命”之后/207
- 在文艺理论方面多做些有力的探索/207
- 长诗《悼念》后记/209
- 现代文学的流派/213
- 评黄宁婴的长诗《溃退》/215
- 《面向着生活的海洋》再版自序/232
- 六十年教学感言/234
- 黄伟经译《猎人手记》序/235
- 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浅见/238
- 《药眠散文选》自序/240
- 《写作通论》序/245
- 关于文学的社会作用(答同学问)/247
- 翻译漫谈/255
- 《黄药眠抒情诗集》自序/258
- 生前未发表的遗稿/265
- 鉴赏论初稿/265
- 创作论/270
- 评《虾球传》/310
- 浅谈《一曲遥寄》/314
- 诗与歌/323
- 诗歌散论/329
- 中国古文论讲稿/332
- 浅谈墨子/332
- 《诗大序》讲稿提纲/336
-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讲稿提纲/344
- 班固《诗赋略》提纲/349
- 王充的文艺思想讲稿提纲/354

曹丕的《典论·论文》讲稿提纲/372

陆机《文赋》的讲稿/382

读《文心雕龙》札记之一：关于刘勰的创作论/397

读《文心雕龙》札记之二：关于刘勰的风格论/424

读《文心雕龙》札记之三：关于刘勰的批评论/447

唐代传奇选(引言)/467

译著/472

德国文学的衰落/472

莱蒙托夫论/473

恩格斯与唯物主义的美学/478

后 记/483

导 语

黄药眠先生(1903—1987)，广东梅县人。青年时期，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开始从事诗歌创作。大学期间专攻英文专业，毕业后经成仿吾、王独清介绍到上海参加了进步文学团体创造社，一边谋生，一边写诗，并开始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后来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并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被派到苏联共产国际工作。1933年回国后，出任中共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不幸被国民党逮捕入狱，被判了十年徒刑。抗日战争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后，被八路军办事处保释出狱。他曾赴延安，在新华社工作。后因病赴武汉治疗。病愈即参与抗日工作。整个抗日期间，他在桂林和香港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地参加了民主抗战的宣传工作，写了大量文艺作品和政论文章。他写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政论，在国统区文艺界和知识界有很大的影响。抗战结束后，他又到香港参与创办了民主大学达德学院，并主编民盟机关刊物《光明报》(《光明日报》的前身)，撰写了大量反对专制内战，争取民主和平的文章，并于1949年春到北京应邀参加了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后凭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他本可以到广东省任省政府委员(见194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但他立志教书做学问，于是辞官应邀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他一方面教书，一方面继续写作，他从没有一天放下写作。我们从这个集子中可以看到，即使在他当“右派”、“摘帽右派”的极端痛苦的时期，仍然从事着研究，写下了很有见解的《创作论》(1962)《欣赏论》(1963)等论文，后来论文写不成了，他写童话，写寓言；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在“红卫兵”的皮鞭下，他仍然在构思着格言、短句，心中仍然涌动着哲理、诗情，“文化大革命”后出版的《面向生活的海洋》就是见证；即使迈进晚年，气力衰竭，他仍然没有停下手中的笔。1980年，加在他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都平反了，他意气风发，写下了铿锵有力的句子：“劫余留铁笔，白手写苍生”。

黄药眠先生是中国现代文艺学学科最早的创始人。1953年，他创立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这是新中国高校成立的第一个文艺理论教研室。1954年他主编当时影响很大的《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1956年，他受教育部的委托编写了新中国第一个《文学概论教学大纲》。1956~1957年间，他参与了当时的美学大讨论，他的论文《论食利者的美学》和《不得不说的话》，提出了“美在评价”的观点，立论之新颖，论述之深刻，都是那场美学大讨论中十分重要的一派观点。但由于他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遭受不应有的批判，连他具有真知灼见的“美是评价”也被忽略。目前研究20世纪50年代那场大讨论的研究文章，一般仅说那场大讨论只产生四派理论，即蔡仪的“美是客观说”，吕荧的“美是主观说”，朱光潜的“美是主观与客观统一说”，李泽厚的“美是实践说”，而忽略了黄药眠先生的“美是评价说”，这是不公平的，我在后面有一段专门要讨论他的美学观点。

黄药眠先生的文学理论和美学论文主要部分收入到《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200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中，这次黄药眠先生的公子黄大地先生认真地多方面地搜集了他父亲的未能收入集子的文章，这些文章充满了黄药眠先生作为一个学者那种对现实一贯的关注与参与的热情，以及联系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活实际的认真的深入的理性思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黄药眠先生给我们留下的时代的缩影，而且也给我们一种启示：在不同的时代，社会面临不同的矛盾和问题，一个理论家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去开拓和探索新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建构新的理论世界。

一、抗日战争时期：鲜明的民族立场和文学中国化大众化的理论思考

文集收入的第一篇文章《论敌人的文化进攻和我们的对策》写于1939年，其时黄药眠先生36岁。青年黄药眠在这篇文章中不仅仅坚守民族大义，而且能一眼看清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策略。黄药眠长期从事抗日的文化活动，他不但知道自己从事这活动的意义所在，而且能从反击敌人的文化侵略的高度来认识这一活动。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知道要打败中国，仅从武力征服是做不到的，它必须在中国人中间，找到它的助手，消灭那散布在广大的人民中间的抗敌的意志和民族的意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敌人自从在沦陷区域开始了他们所谓的“扫荡工作”以来，随着军事的占据与屠杀，他们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文化的进攻。如何实现他们的文化进攻呢？黄药眠说：“制造汉奸理论。很显然的要使中国人做汉奸，除了威逼利诱外，还得替汉奸们制就一副做汉奸的理论底武器，为了

这个缘故，敌国上下现在正在狂吹着：‘日满支合作，以协助为主’，‘以道义为日本的立国精神’，‘对支事件已入到建设时期’，‘协助中国收回租界’。他们这些‘和善’的言辞，显然的，一方面是想企图欺骗我们一部分落后的群众，以引起我们内部的分裂，另一方面，则想把这些‘诺言’送给中国的汉奸们，作为上台的政治资本。”的确，敌人的这些言论是具有欺骗性的，黄药眠不但拆穿了这欺骗性，更重要的是说明了抗日分文武两条战线，我们不但要以自己的武力打退敌人的进攻，而且也要用文章和各种文艺作品，揭穿敌人文化渗透的阴谋，打退他们的文化进攻。如能从这个高度来认识抗日的文化工作，那么抗日的文化工作就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整个抗日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十分重要的。这表明黄药眠鲜明的民族立场和他之所以能积极投身于抗战文化工作的原因。

抗日文艺的方向是什么？这是当时许多文化人考虑的一个问题。黄药眠与大家思考的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化与大众化”。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需要中国化和大众化呢？这是因为从“五四”到三十年代的左联时期的“革命文学”，主要是在精英阶层进行，学习的是西方的新思想，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是在抗日斗争中，依靠的是广大的工农大众，需要他们拿起武器与敌人战斗，如果文化艺术活动，还是一味学习西方，一味囿于精英阶层，这就难免脱离实际。但是，黄药眠在这样思考的时候，有两点新的思想，是那个时候的文化人较少想到的：第一，大众化仍然要坚持“五四”民主精神，他在《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之我见》中说：“今天我们如要谈到继承过去的传统，那么我们就应该更多地注意到五四运动以来的文艺上的成果。这即从运动的本质上说，争取民族独立，和争取民主的基本任务上说，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所以与其到封建主义文学里面的《离骚》那里去汲取新鲜的血液，倒不如向拜伦那里，向玛耶可夫斯基那里去汲取更多的新鲜的血液。新的中国诗歌应该承继世界的优良的传统，同时也应该承继这十余年来已经中国化了的新文艺的传统。”这就是说，文艺的大众化并不是要背离“五四”的精神，恰恰相反是要继承“五四”的传统与精神，如果当时真的这样去实践，也就不存在后来有的学者提出的“抗日压倒启蒙”的问题。第二，中国化与大众化是一致的。他在《中国化和大众化》一文中说：“真的，如果从本质上说起来，中国化的问题也就是大众化的问题。假如一个作家，他能够随时留心到最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把他们的生活态度、习惯、姿势和语言，加以选择和陶炼，如实地写了出来，那么他这个作品一定是中国化的，同时也是大众化。”

确定了文艺大众化之后，文艺是不是完全政治化？如何来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呢？要不要充分考虑到文艺自身的独立性呢？这个问题在当时是很复杂的，要么让文艺脱离政治，要么让文艺从属政治，但黄药眠在当时就发表了一种很辩证很深刻的看法，他在1940年发表的《文艺与政治》一文中指出：“文艺不过是上层建筑的一种，在某种意义上说，文艺不过是政治斗争的一个部分，它为整个政治环境所决定着，比方现在我们对日寇的抗战，所以我们就有抗战文艺，这些文艺作品，都是配合着抗战，而且是和抗战有关的。”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是“如果我们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看作为奴仆对主人的关系，用政治的力量来加以命令，或者把文艺作家都看成为一般政治活动的人物，那又是错了。因为文艺虽然和整个政治动向相配合，然而它有着相对的独立性，而在其发展上亦自有其特殊的内在规律性，如果我们用极端的功利主义去衡量文学，那么我们就常常会把文学限制在一个极端狭小的范围里面，同时由于政治的过分干涉文学，结果就是忽视了文艺的特殊的内在规律性和对创作过程的缺乏理解，以至把奉命创作出来的东西代替了真正的艺术。”这些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十分深刻的，我们似乎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中，才听到类似的话语，但黄药眠早在1940年就很深刻地提出并加以回答。

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鲜明的阶级立场，民主斗士，转向理论战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如何对待汉奸，特别是如何对待汉奸文人，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问题。有些人，在抗日的时候，心是硬的，为抗日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但到胜利到来了，就对那些曾经为敌人做过事的附逆者同情起来，对他们下不了手，采取“温情主义”态度。黄药眠这时大声疾呼，决不能对那些汉奸心软，必须严惩那些汉奸。他撰写了《论文艺的肃奸运动及其他》(1945)一文，决不允许原谅这些附逆者，他说：“如果对这些人也可以宽恕和原谅，那么那些为国牺牲的战士们的血，岂不是白流了么？那些在抗战中受着灾难的同胞们，岂不是白白的把幸福抛掷了么？试想想吧，当敌人整个的摧毁我们的城市和村庄的时候，当我们携男带女，爬山越岭，千里逃难的时候，当我们在荒凉的野地里依靠着结了冰的山岩睡觉，手抓着泥沙和饭粒一齐吞进肚子里的时候，他们，这些落水的文人们，却正坐在敌人的旁边，祝贺着‘胜利’的夜筵，从炖着民脂民膏的汤罐里分饮着羹汤，以卑鄙的谄笑，承迎着征服者腾傲的睨视，试问在这时候，他们也曾想到我们是他们的朋友、同乡、同志，和我们正在远方的山

地里受着迫害和磨难，试问他们也曾为了自己的国家、民族、朋友落下一根头发？如果他们也念旧，也有友情，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不来同我们站在一起！如果对于这些背叛祖国，出卖友谊，唯自己个人的利益是图的人们，也有什么宽恕，那岂不是我们这些奔波万里，为敌骑所追迫，为敌机所威胁，始终坚守着祖国所给予我们的战斗岗位上的文艺战士是愚人是笨伯，而那些翻来覆去，毫无气节的人们，反而成为了识时务的俊杰，成为了时代的英雄，不是的，是非必须明白，黑白必须分明，民族的正义必须伸张，我们必不容许有任何的蒙混，也许他们有的是钱，但让那些乌鸦们去啄食魔鬼们的筵宴吧。我们不要为他们的巧笑所迷惑，如果我们一想起，这些人们会以这同样的笑脸去迎接我们的敌人，那我们就会觉得他们的巧笑不是表示友谊或同情，而是表示无耻和卑劣。对于这些人，我们必须硬着心肠，把残余在我们的意识的角落里的温情杀死！”这道理中带着情感，情感中带着理智，对于“温情主义”给予痛击，立场是坚定无比的。

抗日战争刚刚获得胜利，蒋介石又想搞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专制统治。黄药眠大声疾呼要民主，不要专制。在同一篇文章中，黄药眠说：“本来文艺虽然是有政治性，可是文艺工作者可并不必一定的要直接参加实际的政治斗争。不过在今天的中国，民主主义之能否实现，将会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即中国将变成殖民地的中国，抑或是自由独立的中国。因此这一个斗争，并不是某一部分人的责任，而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特别文艺工作者是人民的喉舌，是灵魂的工程师，因此他更应该享受广泛的自由。没有言论自由，而想艺术的花朵能繁茂起来那是不可能的。可是直至今天，还有人相信，文艺只能写光明面，不能写黑暗面，只能为政府说话，不能为老百姓说话，只能背诵宣传大纲上所发下来的歌诀，而不容许文艺家自由发挥自己的意见。其实，如果要这样的话，政府何不雇用几个鼓吹手来歌功颂德，而一定要来损害艺术家的创作的尊严呢！……我们要反对假的民主，我们需要的是真的民主。因为只有真正的民主，中国才能够强盛起来，文艺家本身的生活才能改善。所以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艺术的前途，我们这些艺人都必须站到战斗的民主的行列里去。”呼吁民主及其施行，是黄药眠这个时期反复做的一件事。他的意见是那样坚定，始终未放弃过自己的民主的呼声。

作为一位理论素养比较高的作家，一生善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善于理论思考，黄药眠对自己队伍中一些关于主观和客观、人性和社会性等理论命题进行论辩。黄药眠作为当时的革命“左派”理论家，很快进入主流话

语状态。他于1945年发表了论文《论约瑟夫的外套》，这篇论文是批评舒芜的《论主观》一文的观点的，其中也牵涉到了胡风的观点，论文发表后受到茅盾等许多人的赞许，认为是“将关系到未来文艺史的一篇主要著作”^①。这段时间，他的主观和客观论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主要观点是对于人的主观和人性不能抽去它的具体的历史内容。因为，“人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成长起来的，当社会分成几个阶级而且互相矛盾的时候，一人的主观，即思想、意识、感情、感觉等，都受着各该阶级的社会存在所制约，所以某一阶级人的主观，总是和另一阶级人的主观不同，我们不能把这些人的思想意识和行动，通通都概括成‘主观’而抽去它们的具体的历史阶级内容。”^②现在看来，这些观点仍然是正确的，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有可能变成谬误。黄药眠从自己的“主观”论出发，接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的理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他在《论诗歌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我们所说的自我改造，是就小资产阶级的作家，要在思想上生活上向劳苦大众学习而言，是就小资产阶级的作家，放弃他们的优越和自尊，放弃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而言，是就小资产阶级的的气质，向大众阶级的的气质转化而言，但是我们并没有意思要否定小资产阶级的作家从过去社会里所训练得来的知识人的敏感，绵密的组织力和文学上的特殊的技术。但只有当作家们思想、感情、生活、趣味、偏爱都一般地转化成与劳苦大众相互同情以后，只有当作家的新的主观形成以后，这些敏感，组织力和技巧，才会变成新的主观构成部分，在大众阶级的革命的精神的引导之下，发挥积极的效力。”这番理论当然不是黄药眠的发明，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命题，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是没有的，在列宁那里也没有明确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封建买办思想，批判恐美崇美思想，都还是对的；但运动的进展却不遂人愿，如是非划不清楚，如承认苏联的生物学是“无产阶级”的，西方的生物学就是“资产阶级”的，后来采用斗争的办法，搞思想检查“人人过关”。这样“思想改造”成为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老知识分子觉得自己的思想没有经过改造，不再敢

^① 参见黄药眠写的该论文的“附注”，见黄药眠：《黄药眠自选集》，485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

^② 同上书，470页

拿起笔来写自己原先熟悉的生活，限制了他们创作的积极性，这对文艺事业来说，是巨大损失。另外，这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出现了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而且有扩大化毛病。继1951到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1954年“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这样一来，似乎只有工农的思想是香的，知识分子的思想都是臭的，于是新社会成长一代知识分子也和老知识分子一样，都成了“臭老九”。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批个人主义运动，1959年的“双反交心”运动和反右倾运动，接连不断，都与“自我改造”运动相关，思想问题转瞬被提升为政治斗争问题，伤了不少爱国的爱党的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其最后是把社会推向“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知青下乡”“接受工农的再教育”，高校则出现了“工农兵学员”的“上管改”问题。这是那些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讲那套“自我改造”、“新的主观”理论的人始料未及的。人的思想当然可以变化、发展，但正如黄药眠所说的那样，人的主观思想是受社会历史制约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社会存在不变更，人的意识如何变呢？因此，要求知识分子完全摆脱社会历史的制约，脱离人的社会存在，而彻底“改造思想”，很快脱胎换骨，放弃他们的优越与自尊，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改造到与工农的思想和习惯一模一样，这做得到吗？

三、50年代初中期，“美学评价”理论的提出，美学大讨论中的第五派

1950年，黄药眠以“左派”教授从香港回到北京，聘为北京师范大学一级教授，隔年就出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同时他还是当时中国文联常委、副秘书长，中国作协常委、顾问，与周扬、李默涵等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过从甚密。他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还是民盟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的理论创造和诗意感情喷涌而出，出版了理论评论集《初学集》、《沉思集》和《批判集》，满怀激情地抒写了《五年计划颂》和《黄河，我要你唱出一首英雄的新时代的史诗》等诗篇。他的理论研究成果《论小说人物底登场》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叙事学的开篇之作。当然最著名的就是1956年参加“美学大讨论”的论文《论食利者的美学》以及当时未发表的1957年6月3日反“右派”开始前夕的讲演《不得不说的话》。本书也收入这篇讲演的速记稿，改名《塑佛篇》。正是在那次讲演中他提出了“美在情感评价”的全新的观点。

现在的学术界，都认为1956年到1957年间那次“美学问题大讨论”，是一次真正的百家争鸣的自由讨论。在我看来，这种理解是有误会的。实